

朝貢的想像： 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

許暉林*

一、前言

「日用類書」一詞在一九五〇年代首先由日本學者酒井忠夫提出，並且為學界廣泛採用，指的是流行於明清時期，以摘抄各種與日常生活相關知識，加以分類、編纂而成的通俗讀物¹。而該類書籍也因為蘊含了豐富的庶民日常生活相關的記載，成為學者用來重建中華帝國晚期日常生活史的重要材料²。但是，如果我們依循酒井忠夫的看法，以提供日常知識的實用手冊來定義該類書籍，那麼我們在探討某些門類時，無疑會遭遇到解釋上的困難。「諸夷門」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諸夷門」所描述的異域風土民俗除了實證地理知識以外，還摻有許多《山海經》當中的異域神怪內容。這樣一個門類的性質顯然與一般所理解的實用性有著相當大的差距。本文目的即是試圖以不同於過去廣被接受的「日常實用性」的概念，來理解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文化史意義。

中國的日用類書最早可以溯源至南宋，而直到清末，甚至民國時期，日用類書仍然繼續出版與流通。本文則是選擇以晚明這段時期所出版的日用類書中的「諸夷門」作為討論重點。這不只是因為日用類書是從萬曆(1573-1620)中後期開始廣泛

* 許暉林，本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¹ 見酒井忠夫：〈元明時代の日用類書とその教育史的意義〉，《日本の教育史學》第1號（1958年10月），頁67-94；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收入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東京：國土社，1958年），頁62-74。

² 近年關於日用類書的研究成果在吳蕙芳最新專著中有詳盡的評述。見吳蕙芳：《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年），頁11-54。

流行，同時也是因為西方世界地理知識剛好在此時傳入中國，恰好可以和晚明日用類書中對於異域的論述形成對照。

目前學界對於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討論，大部分聚焦在「諸夷門」將實證地理知識與神話中的異域神怪混同的這個現象。一般而言，明代日用類書的版面是由上下兩欄圖文所組成。以「諸夷門」來說，上欄多列出《山海經》當中所記載遠古神話中的生物，題為〈山海異物〉；下欄則是對於異域的描述，既包括日本、高麗、真臘等真實國家，也包括像是小人國、一目國、羽民國等只存在於《山海經》中的非人類國家，題為〈外夷雜誌〉。王正華以為，這些四域怪物、傳說物種的存在其實是表現出明代人「好奇」的心態³。三浦國雄則提出，「諸夷門」當中包含的神話成分代表了明人混合了真實與想像的獨特世界觀⁴。吳蕙芳對此提出批評，認為明代日用類書「諸夷門」中真實與想像的混同，在元刊日用類書《事林廣記》當中就已經出現了，並不必然代表著明人的獨特心態⁵。的確，如同吳蕙芳所指出的，王正華與三浦國雄並沒有把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放在更大的類書生產歷史脈絡下思考。但是，吳蕙芳的批評本身也有待進一步討論。首先，吳蕙芳針對「『諸夷門』中的真實與想像的混合」現象的觀察主要是聚焦於日用類書，而沒有談到更早之前的類書傳統。另外，吳蕙芳在批評「明人的獨特性」的說法時，尚未進一步區分《事林廣記》與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中真實與想像混同現象之間的差異。本文即是試圖填補上述方法論中尚未完足之處。

在討論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之前，我想先談《山海經》當中的神話傳說國家與傳統「諸夷」這一個知識範疇的關係。「諸夷」作為一個確立的知識範疇，主要是開始於正史的諸夷／四夷列傳。在諸夷列傳當中，我們看不到《山海經》與「諸夷」的連繫。自《史記》以下，正史的諸夷列傳從未採用《山海經》當中的內容，反而對於《山海經》中各種奇怪的異族描述持保留態度。例如，在《史記·大宛列傳》中，太史公談到張騫使大夏、窮河源，卻不見傳說中高二千五百餘里的崑崙山時，就清楚地表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

³ 見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頁6。

⁴ 見三浦國雄：〈『萬寶全書』諸夷門小論——明人の外國觀〉，《漢學會誌》第44期（2005年3月），頁245。

⁵ 吳蕙芳：《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頁34-35。

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⁶而《漢書·李廣利傳》「贊曰」也持相同的看法，以為：「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⁷到了《周書·異域傳序》，史家依然認為：「求之鄒說，詭怪之跡實繁；考之《山經》，奇譎之詞匪一。周、孔存而不論，是非紛而莫辯。」⁸史家這樣的態度，當然與《山海經》的性質在當時是如何被理解密切相關。歷代的學者對於如何恰當地將《山海經》放在知識分類架構中，意見一直相當分歧。《漢書·藝文志》把《山海經》歸入術數略形法家；《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將它列入史部地理類；《宋史·藝文志》則將它歸入子部五行類；至明代，胡應麟(1551-1602)以《山海經》為「古今語怪之祖」⁹。而清代《四庫全書》則把《山海經》列為子部小說類異聞之屬，認為《山海經》「實則小說之最古者爾」¹⁰。這樣的分類差異，一方面是因為《山海經》內容多樣而複雜，本身就有分類上的困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不同時代的讀者會有相異的知識分類標準。然而，即使《山海經》在唐代與宋代被歸入史部地理類，它並不被認為可以作為正史中「諸夷」相關書寫的取用資源。這樣的現象其實並不難以理解。因為，「諸夷」這個概念是建立在中國與異族的朝貢關係之上，而《山海經》當中的異域神怪卻從來無法透過這樣的接觸被確認。

一直沒有被納入正史「諸夷」範疇中的《山海經》，最終是在類書「諸夷」類門中找到了它的容身之處。然而，這並不意味到了日用類書開始流行後，《山海經》才與「諸夷」的知識範疇產生了連繫。事實上，《山海經》當中的異域神怪第一次進入「諸夷」知識範疇，要追溯到更早的北宋官修類書《太平御覽》的「四夷部」。也就是說，《山海經》當中的異域生物被納入日用類書中的「諸夷門」，是承襲自更早的類書書寫傳統，而不是日用類書所獨有。因此，在面對晚明日用類書

⁶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駟集解：〈大宛傳〉，《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卷123，頁3179。

⁷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張騫李廣利傳〉，《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卷61，頁2705。

⁸ [唐]令狐德棻等撰：〈異域傳序〉，《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卷49，頁883。

⁹ [明]胡應麟：〈四部正訛下〉，《少室山房筆叢》（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86冊），卷16，頁3a。

¹⁰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3624。

的「諸夷門」時，我們首先該問的並不是《山海經》當中這些異域神怪為什麼可以出現在日用類書的「諸夷門」當中，而是《太平御覽》中用以容納為正史所排斥的《山海經》內容的架構，是如何被後來的日用類書所吸收與改變；而這樣的改變在晚明又有何社會、文化意義。

本文主要分為三個部分，試圖對以上的問題提出解答。類書的編輯在本質上就是透過分類方式，對知識範疇進行定義。因此在本文的第一個部分當中，我將透過比較元刊本《事林廣記》到晚明所出版日用類書中「諸夷門」的編輯方式，分析編輯方式的改變如何影響「諸夷」此一知識範疇的形塑。其次，雖然「諸夷門」作為類書的一個門類有其文類上的傳統，但是我們仍然不能忽略它其實是存在於以日常生活知識為主要內容的類書當中這個事實。因此，接著我將藉由重新思考「實用性」的概念，並且在晚明朝貢體系崩潰的社會文化脈絡下，探討晚明日用類書中「諸夷門」的意義。本文最後則是透過閱讀晚明世界地圖，探討晚明日用類書中的異域想像，是如何影響中國對於西方世界地理知識的接受方式。透過這樣的分析，本文試圖提供一個比過去學者在討論晚明日用類書的「諸夷門」時，所習慣假定的實證地理知識與想像虛構之間二元對立框架要更為立體的文化史圖像。

二、從《事林廣記》到《萬寶全書》

雖然直到明代萬曆年間，日用類書才開始真正大量刊刻，但是目前可以見到最早的日用類書版本，是元刊南宋陳元靚編輯的《事林廣記》¹¹。《事林廣記》在南宋、元、明三代，一直都有增補刪訂的版本流傳。本節即是希望藉由比較《事林廣記》以及明代不同版本日用類書中「諸夷門」的編輯方式，釐清編輯方式的改變是如何影響從元代到晚明日用類書中異域知識的形塑，以理解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中異域論述的獨特性。在比較當中，我將檢視包括不同版本的差異、異域論述相關文本的借用與挪用過程，甚至是類書所特有的版面設計需要等因素。唯有當我們將這些書籍生產的物質面向也納入考慮，才有可能更為恰當地理解晚明日用類書中諸夷論述在明代文化史上的意義。

¹¹ 關於明清日用類書版本的考訂，見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年），下冊，頁355-385。

如前所述，《山海經》中的異域神怪第一次進入「諸夷」知識範疇，可以追溯到北宋官修類書《太平御覽》的「四夷部」。《太平御覽》的「四夷部」依序以東南西北的方位列出四夷。這些四夷資料的來源多樣，除了正史諸夷列傳、風土志、筆記當中的記載，也包括像是《山海經》、《神異經》、《異物志》、《外國圖》等博物著作。而從後者擷取而來的條目，主要是集中於《太平御覽·四夷部十一·南蠻六》的最後部分。顯然，《太平御覽·四夷部》的編輯者在條目編排上，是依循著以正史可徵記載為優先原則。在成書於南宋末年的《事林廣記》其早期版本對於諸夷條目的編排方式，相當程度上就是承襲這樣的編輯原則。

《事林廣記》成書於宋末，但是並沒有宋刻本傳世。目前可見到的元代版本有三個系統，分別是日本元祿十二年(1699)翻刻元泰定二年(1325)刊本(題名並不一致，故以下以泰定本稱之)、元至順年間(1330-1333)的《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以下以至順本稱之)，以及元後至元六年(1340)的《纂圖增新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明代幾種刻本都屬於上述系統的重刻本¹²。由於至順本與後至元本的「諸夷門」類在內容與編排上完全一致，因此以下就以泰定本與至順本進行比較。

在泰定本《事林廣記》中，諸夷相關類門在該書卷八，題作〈島夷雜誌〉。其內容主要是羅列由中國港口出發經由海路可到達的國家，包括地近中國西南的占城、賓童龍、真臘、三佛齊等國，一直到遠方的大食國、天竺國等。〈島夷雜誌〉中的異國是以和中國由近到遠的距離為順序排列。在〈島夷雜誌〉當中，靠近中國西南部的國家之條目標示了航行風向以及從廣州出發所需時間。例如，占城國條當中，就寫著「占城國在海西南。自廣州發舶至諸番惟占城為近，順風八日可達」。真臘國條則說「真臘國舟行北風十日可到」。然而，對於更遙遠的、無法在幾天內航行抵達的國家，則沒有相關資訊。這種條目安排的方式顯示〈島夷雜誌〉的編輯是遵循實際航行經驗，愈近中國的國家資訊愈詳細，離中國愈遠的國家則資訊相對

¹² 關於《事林廣記》版本問題的研究，見胡道靜為1963年中華書局影印元至順本《事林廣記》所寫的〈前言〉，以及森田憲司：〈關於在日本的《事林廣記》諸本〉，收入鄧廣銘、漆俠主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266-280。後者經部分修改後，與胡道靜的〈前言〉一併收入〔宋〕陳元靚：《事林廣記·附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據1963年版《事林廣記》影印)，頁559-572。

缺乏¹³。泰定本的編輯者在〈島夷雜誌〉底下註明「此本符廣舶官本」，大約是指這些記述與南宋廣州市舶司所刊行的航海路程紀錄相符。雖然這所謂的「廣舶官本」指的是什麼著作並不明確，但是顯然地，〈島夷雜誌〉的內容許多部分是原文照抄自宋代趙汝适(1170-1228)在泉州市舶司提舉任內所作的《諸蕃志》¹⁴。泰定本卷九題作〈山海雲異〉，前半部分羅列《山海經》中的各種異獸，後半部分則是《山海經·海外經》當中的類人生物，例如不死人、聶耳人、三首人等。從這個編輯方式看來，泰定本《事林廣記》的編輯者是將真實國家與傳聞中非人類國家區分開來。



圖 1：《新編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島夷雜誌》（1699 年日本翻刻 1325 年刊本）

¹³ 然而，在這裏我們必須說明的是，〈島夷雜誌〉與〈山海雲異〉的對比不應被理解為「實用航海指南」與「神話傳說」之間的差異。因為，就這些摘自《諸蕃志》的條目看來，我們很難想像，單單依靠風向以及日程，就可以順利地引導海上旅行者從中國的港口航向外國。關於日用類書的實用性問題，下文有較為詳細的討論。

¹⁴ 見〔宋〕趙汝适：《諸蕃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據《學津討原》本影印）。

更晚一些於至順年間與後至元六年的《事林廣記》版本，則是在編輯方式上出現了有趣的變化。這兩個後出的版本將相關類門題作〈方國雜誌〉。這兩個版本與較早泰定本之間的差異在於，前者在泰定本中〈島夷雜誌〉所羅列的國家後面，加上了十餘個歷代筆記中記載的非人類國家並註明其出處。例如，都播國（出《神異錄》）、奇肱國（出《博物志》）、懸渡國（出《酉陽雜俎》）、繳濮國（出《廣州記》）等等。最後再加上原本泰定本置於〈山海雲異〉中出於《山海經》的類人生物。也就是說，在泰定本中屬真實的、由水路可到達的異國與《山海經》、《神異錄》、《博物志》當中的類人生物是區分開的，但是在至順本與後至元本當中則是被合併在一起。這一個版本上的差異，其實標誌出了類書編輯者對於域外地理不同的想像方式。從泰定本的編排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人類與非人類國家並不是共享同一個空間，不論是紙上空間或者是地理空間。在泰定本當中，〈島夷雜誌〉裏的國家可以從中國南方的港口出發，然後經由海路抵達。但是，來自《山海經》當中的非人類國家，則是需要另闢一個神話空間來安置。事實上，《山海經》原文是以「國」來稱這些非人類國家，例如不死國、聶耳國、三首國等。而泰定本《事林廣記》在敘述這些國家時，其內容雖然是照錄《山海經》原文，但卻將標題從某某「國」改為具有生物意涵的某某「人」。儘管這個改動很細微，但是從頭到尾都相當一致。這說明了泰定本《事林廣記》的編輯者的確是有意識且系統性地做這樣一個改動。如此改動，強調的是物種之間的絕對差異，而不只是文化上的差異。換句話說，這些神話傳說中的異族並不足以成「國」。這也的確合乎將非人類擺放到〈山海雲異〉當中，以和〈島夷雜誌〉區分開來這樣的編輯安排。

如前所述，至順本則是將〈山海異物〉與〈島夷雜誌〉放在一起，合併成〈方國雜誌〉。然而，若是將這樣的改變僅理解為真實與想像的混同，恐怕是過度簡化的解讀。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至順本在把原來放置於泰定本〈山海雲異〉裏的非人類納入〈方國雜誌〉的同時，又將各個條目從某某「人」改回了某某「國」。然而，這並不是意味著只是回歸到《山海經》的原文。事實上，這樣的改動也符合至順本〈方國雜誌〉的編輯邏輯。至順本〈方國雜誌〉其內容編排是具有層次的：最開始的部分是官方記載確為真實的國家，中間的部分是近代筆記所載、傳說中由人類或非人類組成的國家，最後是遠古著作《山海經》當中的非人類。這樣的編排方式再現了傳統的地理想像：離中國近則得天地正氣而成人形，離中國愈遠則得天地之濁氣，所以是類人而非人。當然，這符合由華夏中心向外擴展之倫理意義的傳統

地理想像方式。但是，我們也必須指出，組成〈方國雜誌〉的三個部分，由先至後分別是宋代的航海誌、晉代至唐代的博物類筆記，最後是成於戰國的《山海經》。也就是說，〈方國雜誌〉的組成，在地理上依次是由近到遠，在形體上依次是由人類到非人類，而在文本的選擇上則是依次由晚近到古代。這樣的編輯實踐不僅讓泰定本中未經馴化的類人生物轉變為地理上的異國，顯現一種將非華夏文化、非人類生物納入同一個文化世界秩序的概念，同時也是展現出將由晚近到遠古的地理知識重加組織，並且納入一個共享的當代地理以及文本空間的企圖。

除了《事林廣記》在明代的增訂本以外，絕大部分明代的日用類書是在萬曆年間出版。與《事林廣記》比較起來，明代日用類書的版面出現了重大的改變。明代（特別是福建地區）出版商為了節省成本，在許多書籍的版面設計上採取了一頁分為上下欄，每一欄分載不同內容的編排方式。就日用類書的「諸夷門」而言，除了版式也從傳統的每頁直行書寫，變成了一頁分成上下兩欄以外，還在上下兩欄當中都為每一條目配上插圖。以萬曆年間最流行的日用類書《萬寶全書》為例，「諸夷門」的上欄是〈山海異物〉，下欄是〈外夷雜誌〉。這樣的區分方式似乎是沿襲泰定本《事林廣記》中的〈山海異物〉與〈島夷雜誌〉的區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與泰定本《事林廣記》不同的是，在《萬寶全書》中，非人類生物並不是被放在上欄的〈山海異物〉，而是放在下欄的〈外夷雜誌〉當中，並且與人類的國家交錯並列。例如，出自《山海經》的羽民國就被擺放在位於爪哇北方的國家莆家龍旁邊。類似的例子在其他晚明日用類書中不勝枚舉。這既不同於泰定本《事林廣記》將真實國家與類人類生物區分開來，也不同於至順本《事林廣記》將類人生物所組成的國家擺放在〈方國雜誌〉最後來表達一種層級性的文化次序概念。相對地，《萬寶全書》的編輯方式表現出一種嚴格意義上真實國家與非人類國家的混雜排列。

但是，《萬寶全書》的〈外夷雜誌〉將真實國家與《山海經》中的國家混雜排列，與其說是日用類書「諸夷門」當中的突變，不如說是日用類書編輯者吸收當代文人異域論述的結果。三浦國雄在他關於《萬寶全書》「諸夷門」的研究中指出，《萬寶全書》以及其他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內容很可能是承襲自元代周致中不

¹⁵ 三浦國雄：〈『萬寶全書』諸夷門小論——明人の外國觀〉，頁 232-233。

同版本的《羸蟲錄》（後改稱《異域志》），而在諸國的排列順序上又另加變動¹⁵。儘管如三浦國雄所言，「諸夷門」並非完全依照《羸蟲錄》中諸國的排序，但是就像葛兆光指出的，將那些航海數日可達的中國西南方國家與《山海經》中的非人類國家相互交錯混雜的情況，在《異域志》當中是已經存在的了¹⁶。換句話說，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中實證地理知識與《山海經》中非人類的異族交錯混雜的情況，並非晚明日用類書所特有，而是承襲自元末明初的旅行誌。

然而，這一文本影響的事實並不意謂著日用類書的「諸夷門」只是《羸蟲錄》的圖像化而已。日用類書獨特的版式設計需求，使得實證地理知識與《山海經》的混同更趨明顯。日用類書的版式設計為每卷分為上下兩欄，因此每卷最後一頁的上下欄內容理論上都必須剛好結束。但是，在排版的實際操作上，卻很容易遇到上欄已經結束而下欄仍未結束（或者相反）的情況。因此，就常會有為了整齊版面而將



圖 2：《妙錦萬寶全書》「諸夷門」（1612 年刊） 圖 3：《三臺萬用正宗》「諸夷門」（1599 年刊）

¹⁶ 見葛兆光：〈《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域記憶——利瑪竇來華前後中國人關於異域的知識資源及其變化〉，收入鍾彩鈞、楊晉龍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 年），頁 360。

原本應該放在下欄的內容移到了上欄來拼湊的情形發生。就《三臺萬用正宗》「諸夷門」的例子來說，為了遷就排版上的需要，不僅是中途將原本上下兩欄式的設計變更為均分的三欄或是四欄，混淆了上下兩欄版式所區分出來的「神物」與「諸夷」的界線，甚至還將應該擺放在下方「諸夷」欄中的人類國家移到了上欄「山海經異象」當中。這麼一來，三浦國雄所謂真實與空想的混同就不只是存在於下欄的「諸夷雜誌」當中，同時還以跨欄位的形式呈現出來。

從以上對《事林廣記》諸版本到萬曆年間日用類書編輯實踐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從南宋末年至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呈現出不同的編輯思維：首先是嚴格區分實證知識與《山海經》中的記述，接著是透過層次性的編輯將《山海經》中非人類國家納入地理與文本空間的最外圍，最後則是混雜，甚至模糊所有的界線。

三、一種朝貢的想像

關於中國人對於異域的想像，葛兆光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儘管元、明以來中國人對於異域的實測知識愈來愈多，可是為什麼對於異域的想像卻仍然常常來自對古典的揣摩和理解？」¹⁷ 其實，就日用類書而言，這個問題本身或許就需要被修正。首先，如同先前所說的，實證地理知識與《山海經》古代地理知識的混合在日用類書中不僅是被保留下來，而且還是愈來愈明顯。再者，在進一步討論「諸夷門」中真實與想像混同的問題之前，其實有必要更為細緻地檢視，所謂的「想像」究竟是在哪一種意義上是成立的。我認為，將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當中所記載的國家，簡單區分為真實存在與傳聞想像，恐怕是過於簡單的分法。因為，「諸夷門」當中那些非取自實測紀錄的異域知識，並非就是出於《山海經》或《搜神記》等文獻中具有神話傳說成分的記載。事實上，這些國家不少是歷史上曾經出現，但在晚明時已不再存在的國家，像是焉耆、回鶻、大秦等國。這些過往時間中出現過的國家，與《山海經》中的國家，以及像是《諸蕃志》等旅遊誌中所記載的國家一同出現在日用類書「諸夷門」當中，並且交雜地存在著。例如《妙錦萬寶全書》的「諸夷門」就把來自《山海經》的穿胸國置於唐代西域古國焉耆國旁邊。而這種編排方式，在周致中的《異域志》當中是見不到的。明代日用類書將歷史中出現過的

¹⁷ 見葛兆光：〈《山海經》、《職貢圖》和旅行記中的異域記憶〉，頁 350。

國家放入「諸夷門」的作法，其實說明了「諸夷門」當中的「混雜」不應該只被理解為真實與想像的並存，而更可能可以被理解為打破真實與虛構的認識框架，讓不同時間中的地理知識同時出現，並在文本地理空間上讓各個國家互相連結、滲透、交疊、覆蓋的論述方式。至於那些歷史上的國家到了晚明究竟消失了沒，在當時的地理空間中是否能找到，並不是編輯者所關心的重點。從這個角度來看，《山海經》中的異域神怪與強調實證地理知識是否被日用類書編輯者拿來對比為想像與真實之間的差異——以及《山海經》與實證地理知識的並陳是否可以被理解為想像與真實的混合——就變得很有問題了。因為，如果「諸夷門」中的混雜是一種歷史地理知識的混雜，那麼晚明日用類書編輯者或許就不是將《山海經》理解為與「真實」對比的「想像」或虛構的文本，而是將之理解為古代地理知識的一部分。所以，儘管晚明日用類書的「諸夷門」與元代至順本《事林廣記》對於地理知識的論述方式極為不同，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見從元代到晚明的日用類書的「諸夷門」都表現出以其特有的編輯方式去安置古代地理知識的傾向。

如果從元代到晚明的日用類書編輯者是透過「諸夷門」去吸收並且安置古代的地理知識，那麼讀者或許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古代地理知識的安置對於日用類書是如此重要？」我認為，重點或許不在於為什麼安置古代地理知識對日用類書編輯者而言是重要的，因為就如王正華指出的，各種知識的採集與分類原本就是類書此文類的特性¹⁸。更重要的問題，恐怕還是在於晚明日用類書安置這些異域知識的方式，與更早的類書之間有何不同，以及這些差異又有什麼意義。我認為，晚明日用類書中「諸夷門」安置古代地理知識的方式，某方面來說，可以被視為對於古代地理知識「日常實用化」的例證。

商偉對日用類書的日用性提出了具有理論意義的看法。他認為，日用類書與其說是對於明代日常生活的忠實反映，不如說是一套關於何謂日常生活的論述。這樣一套論述同時又透過日用類書不斷發行再版、修訂增補，反過來形塑讀者對於社會生活的想像¹⁹。在此，我轉用商偉的看法，進一步將日用類書的日用性理解為類書

¹⁸ 見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頁6。

¹⁹ See Wei Shang, "The Making of the Everyday World: *Jin Ping Mei* and the Encyclopedias for Daily Use," in David D.W. Wang and Wei Shang, eds.,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pp. 63-92.

所呈現出來某種「關於日常實用」的論述方式。具體地來說，這樣的論述方式指的是，它宣稱書中所提供的資訊是應該視為可以被驗證遵循，而其效果以及經驗是可以被複製的。例如在從元、明日用類書「醫學門」中，古代處方即刻性的治療效果常常被描述為「服之立效」、「無有不驗」、「甚效且驗」。而隨著新的增訂版本推出，總是有更多、更新的古代藥方加入。雖然針對同一症狀的「甚驗」藥方一直在改變且同時並存，但是處方的可信度與治療方法的可重複性卻是不斷地被強調。也就是說，日用類書之所以是實用的，不只因為編輯者選擇了（或至少是宣稱選擇了）實用的日常生活知識作為內容，同時也是因為編輯方式使得原本模糊、難以驗證的知識被描繪為可以被每位讀者輕易掌握。《事林廣記》當中的「競辰之圖」就是典型的例子。如同 Stephen West 所指出的，「競辰之圖」以數量化的方式，設計出線型日程表，為科舉考試的應試者提供一整套準備方針。這樣一套考試準備時程表將知識客觀化，使通過科舉所需知識的獲得不再只能依靠讀者的心領神會，而是可以被每個人按照步驟去重複實踐²⁰。另外，對於晚明日用類書的讀者（特別是在外經商者）而言，最為重要卻又難以掌握的就是與旅行路程相關的資訊。晚明日用類書「地輿門」當中，通常都收有「兩京十三省路程」或「天下路程玉鏡」之類的路程書，提供旅行者關於從京城到各省所經過的地名、兩地之間的距離、甚至是旅途中需要提防的陷阱及危險等資訊。在路程書的最後還附上「路程歌」，把從京城到地方旅行所需地理知識，包括方向、交通工具轉換等資訊，透過歌訣形式將前面交代過的資訊總結成一條條可以讓旅行者易記熟背的路線。我所謂日用類書的實用性，與其說日用類書的內容是確定可以被實踐的，不如說是日用類書中對於某個目的地（不論是抽象的或是實際的）是可以藉由特定步驟、工具、時間到達的一再強調與保證。若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該做的就不再是嘗試去解釋「諸夷門」與實際日常生活的關係何在。相反地，我們要問的是，類書編輯是如何在實踐這種日用性原則的同時，構築與組織了「諸夷門」的內容？

明代日用類書「諸夷門」雖然是承襲元代以降士人的異域論述，但是同時也對之進行一定程度的實用性轉化。轉化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將「諸夷門」中的國

²⁰ See Stephen H. West, "Tu 圖 Good to Be True: Programmed Learning in So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Oct. 25-27, 2002, pp. 2, 16.

家和中國的距離以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所需日程的方式加以呈現。從晚明開始，日用類書的「諸夷門」開始大量出現某某國「至應天府（馬）行幾年幾個月」的表述方式。以特定旅行交通工具來丈量中國京城或重要城市與諸夷國之間距離的表達方式，並不是晚明日用類書的首創，而是在《事林廣記》或者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所據的《異域志》中就已經廣泛使用了。但是，在這些較早的類書以及旅行誌當中，這樣的表達方式都只見於對於像是占城國或者真臘國等晚明中國沿海國家的描寫。相對地，萬曆年間之後刊行的日用類書「諸夷門」中，這樣的表述方式開始被極為大量地使用在各個國家的描寫當中，特別是用來描寫傳聞中遙遠的人類國家以及非人類國家。例如，一五九七年刊本《天下四民利用便觀五車拔錦》說由狗頭人身的男性與漢人女性組成的狗國「至應天府馬行二年」；身材短小，面體盡毛、穴居的長毛國「至應天府行二年零十個月」；會行兵打仗保衛家園的猴孫國「至應天府行三年」；膝下生毛、馬蹄、善走，自鞭其腳一日可行三百里的丁靈國「至應天府馬行二年」。一五九九年刊本《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的「諸夷門」中也有同樣的描述。一六〇七年由進士王圻(1530-1615)所編輯，一六〇九年刊刻的《三才圖會》、一六〇七年刊本《新刊翰苑廣記補訂四民捷用學海群玉》以及一六〇九年刊本《鼎錄崇文閣彙纂士民萬用正宗不求人全編》同樣沿用，只是順序稍有不同。一六一四年刊本《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除長毛國沒有收錄以外，其他皆同。值得注意的是，一六一〇年刊本《新刻全補士民備覽便用文林匯錦萬書淵海》沒有收錄狗國與丁靈國，但是保留了猴孫國與長毛國，並且加入了「其人三爪」的烏孫國「至應天府馬行五個月」的描述。在一六一〇年以前刊行的《五車拔錦》、《三臺萬用正宗》等日用類書當中都收錄烏孫國一條，但當中並沒有「至應天府馬行幾個月」這樣的表述。這



圖 4：《萬書淵海》「諸夷門」（1610 年刊本）

說明了對於《萬書淵海》「諸夷門」的編輯者而言，「至應天府馬行幾個月」是一種可以用來賦予所描述的國家特定意義的表述方式。我認為，這樣一種表述方式，其實是表現出一種可以透過交通工具將遙遠神祕不可知的異國與中國的關係具體化、經驗化的概念。

當我們將這樣的表述方式對照於先前提到的，晚明日用類書混雜古代地理知識的傾向，則可以發現某種同時具有歷史維度以及實用性的異域論述在晚明日用類書當中形成了：中國的沿海鄰國、傳聞中的遙遠國家、《山海經》中的類人生物、在歷史時間中已經消失了的國家之間，儘管沒有由路程書所提供的一條完整設計好的路線串連起來，卻是可以透過「諸夷門」當中錯雜的版面編輯以及船行與騎馬互相交通。這些國家同時又常被描述為與某某國服裝、風俗相類似。例如，後眼國就被描述為「結束與韃靼同」。這樣的敘述固然一方面讓這些國家的存在看起來更為真實，但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將這些國家納入一個互相影響的文化體系之嘗試。這樣的論述固然不是如旅行誌或者路程書一般提供旅行者旅途實用參考。但我也認為，這可以被理解為明代人對於旅行到異域的路程想像。因為，與旅行概念不同的是，「至應天府馬行幾個月」表達的並非旅行經驗所強調由中國出發探索域外的概念，而是從所描述的異國出發到達中國的概念。

從異國出發到達中國這個概念所代表的，很明顯就是諸夷對中國的朝貢關係。事實上，如果我們往前追溯，就可以發現，「至應天府馬行幾個月」這樣的表達方式不僅是一種實用化傾向的顯現，而是承襲自史傳傳統中諸夷列傳的異域書寫。從《漢書》開始，正史對於四夷的描述就採用了「去京城幾萬幾千幾百里」、「海行幾月幾日」、「其俗與某某國同」的表示方法。到了宋代，這種對於諸夷國的描寫方式除了見於史書之外，也被《冊府元龜》這樣官修大型類書所採用。而宋代之後的海上交通頻繁，使得明代初年修《元史·外夷列傳》時，類似「（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馬八兒等國）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的描寫，變成了史書記述海外諸夷國的習慣語法²¹。也就是說，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當中「至應天府馬行幾個月」的表述方式，以日用類書的文類特性來說，可以被視為一種經驗化與實用化的傾向，同時從它借用正史諸夷列傳的書寫模式的角度而言，也代表了一種關於朝貢

²¹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點校本），卷210，頁4660、4669。

體系的論述。

事實上，朝貢的概念不只在「至應天府馬行幾個月」的表述上可以見到。最明顯的例子，當然就是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卷首插圖經常使用的諸夷入京進貢圖。這說明了朝貢的確就是「諸夷門」最重要的主題。另外，我們從某些版本的日用類書「諸夷門」當中加入了諸夷國「土產」的現象，也可以看到朝貢主題是如何被呈現的。在一六〇七年刊本《學海群玉》的「諸夷門」當中，類書編輯者對《山海經》中奇肱國的描述，除了沿用自過去日用類書的內容之外，還附加說明該國「土產」包括了珍珠與異物。對照晚明日用類書中大量出現「至應天府馬行幾個月」的表述來看，

這則對於奇肱國土產的附加說明，與其說是以海上商業旅行為出發點所做的描述，不如說是以異族到中國朝貢為思考中心所做的描述。這一種將《山海經》中的異域諸國、土產與朝貢結合起來的論述，同時也反映在當時文人筆記當中。曾任國子監祭酒、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的顧起元(1565-1628)，在他的《客座贅語》中就記載了一則萬曆四十年(1612)小人國入貢的事件：「萬曆壬子，小人國入貢，舟泊石城。其人長可二尺許，紺髮綠睛，作反手字，有衣綠衣，多摺縫，方巾，與中國類者。所貢錦雞凡四，青鸞一，白鸚鵡四。兩大晨雞，其一重五十觔，狀類中國之雄，而身肥，冠聳高四尺許。」²²誠然，《客座贅語》這種語談類的書籍本身已經暗示了這條資料的來源極可能是來自耳語傳聞。但是，就這條資料的敘事方式來說，小人貢獻錦雞一事卻儼然出自顧起元這位明朝中央大員的親眼所見。



圖 5：《妙錦萬寶全書》「諸夷門」（1612 年刊本）

²² 顧起元：《客座贅語》（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卷 1，頁 26a。

對照《事林廣記》或是更早的《太平御覽》對於《山海經》中異域怪物的呈現方式，我們或許可以這樣看待晚明日用類書的「諸夷門」：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遠遠不只是為了滿足讀者博物好奇的閱讀趣味，而是結合了日常實用的論述與史傳傳統的諸夷論述模式，在文本中重新組織了中國與域外的關係，強調某種對海外諸夷向明朝中央朝貢的想像。

晚明日用類書的「諸夷門」對於朝貢的興趣，其實牽涉到當時最迫切的職貢關係崩潰的問題。嘉靖以後南方倭寇與萬曆以後北方女真的侵犯加劇，使得諸夷不再只是搜奇的對象。夷寇的進犯不只是對邊防官員來說是無比沉重的壓力，對一般平民更是會出現在生活中的真正威脅。特別是對於日用類書出版最多的福建地區人民來說，夷寇問題無疑是最真實的生命經驗。當現實中朝貢體系已經崩潰，中央政府無法透過朝貢關係結構政治與文化秩序的時候，日用類書的「諸夷門」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民間透過書籍生產的方式，對於重新建構朝貢秩序所做的嘗試。從書籍市場的考量上來說，書坊主為了拓展書籍銷路而不斷藉由增訂、補訂的方式，在日用類書當中提供各種最即時的資訊以吸引讀者，是常見的行銷手段。而日用類書的編輯對內容不斷增訂、補訂，當然也代表著對知識與資訊的不斷蒐集。但是，這樣的蒐集並不只是知識的撿拾與蒐羅。特別是在「諸夷門」而言，新知識的蒐集，其實也就是對於職貢國以及其物產的蒐集。我認為，類書透過不斷增訂來蒐集職貢國及其物產，與朝貢關係的重新想像是具有密切關聯的。誠然，晚明日用類書當中，對於諸夷知識的建構，並不像正史的諸夷列傳那樣，系統性地依東南西北等方位進行分類。但是，類書編輯者蒐集某種資訊，並且將這些資訊歸類入某個門類這一行為本身，就牽涉到選擇與分類。而選擇與分類，其實也就暗示著某種秩序與結構重新安排的嘗試。在這個意義上，「諸夷門」這個門類存在於晚明日用類書當中，而且隨著不斷刊印而蒐集愈來愈多對於各諸夷國以及物產的資訊，不只是受好奇、博物之風影響，更是因為日用類書的編輯者透過知識蒐集與分類的過程，試圖建立某種在現實國際政治情況中已經失落了的秩序。

透過比較晚明與清代以後所刊行的日用類書「諸夷門」，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對於諸夷知識的形構與現實中維繫朝貢體系之需要的關係。與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相較，清代之後的日用類書當中，類似「至應天府馬行幾個月」的表述即便不見得完全消失，但顯然遠不及明代來得明顯。例如，一七五八年刊本《新鐫增補萬寶全書》的「諸夷門」中，有六個諸夷國家是以「至應天府馬

行幾個月」來描述，分別是西番國、擺里國、大羅國、深烈國、土麻、蛇（虵）魯國。雖然就比例上而言，並不見得比晚明日用類書來得低，但是我們必須注意，這個一七五八年的版本完全不收錄原本在晚明日用類書中大量出現的《山海經》當中的國家。類似情況也出現在一八九五年刊本《新增懸金萬寶全書》當中。雖然《新增懸金萬寶全書》「諸夷門」穿胸國一條（此刊本中極少數摘自《山海經》的條目之一）有「土產：千里馬、角端、土撥鼠、沙雞」這樣的描述，但是該刊本「諸夷門」四十七個國家中，只有對三個國家的描述使用到「至應天府馬行幾個月」表述，分別是西番國、巴赤吉國以及不刺國，所占比例十五分之一不到。這與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對各國描述當中使用該表述方式的比例——最低八分之一，如《萬書淵海》；最高到四分之一，如《妙錦萬寶全書》、《五車拔錦》、《三臺萬用正宗》——相差懸殊。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晚明日用類書編輯如何在類書不斷增補、改訂、重刊的過程中，結合了類書實用性論述與正史諸夷書寫的模式，重新組織包括《山海經》在內的古代地理知識與元、明以後實證地理知識之間的關係，作為在朝貢體系崩潰的政治情境下，重新想像朝貢關係的嘗試。然而，我們同時也必須指出，在討論這樣的文化生產時，除了將其視為對於朝貢體系崩潰所作的回應之外，另一個不能忽略的文化脈絡則是萬曆晚期西方地理知識的傳入。下一節即是要透過閱讀晚明時所流行的世界地圖，探討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中的朝貢關係想像，是如何影響中國對於西方世界地理知識的接受方式。

四、當日用類書遇見世界地圖

從目前可見的日用類書版本來看，明代日用類書的大量刊刻大約是從一五九〇年代開始。而就從一五八三年開始，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從澳門進入中國傳教，並且引入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識。因此，我們幾乎是不可能在不考慮西方地理知識傳入的脈絡情況之下去談日用類書的諸夷朝貢想像。在這個小節當中我想討論的，某程度上仍然是學者在討論晚明中西文化接觸時常會觸及的，以中國本位的朝貢體系思考如何面對西方地理知識架構的衝擊議題。然而，我並不在短短一節中做一個十七世紀中西地理知識交流史相關的大敘事，而是想從文類接受史以及文本互文性的角度出發，以兩幅晚明世界地圖為例，就晚明日用類書

中的朝貢體系想像與晚明中國的世界地圖繪製之間的關係提出初步的觀察²³。

目前可見最早標示出《山海經》中的古代傳說中國家位置的西方世界地圖，是收入馮應京(1555-1606)在一六〇二年刊刻的《月令廣義》中的利瑪竇「山海輿地全圖」摹本²⁴。這幅地圖的原本是一六〇〇年利瑪竇應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要求，在南京繪製而成。這幅「山海輿地全圖」摹本與利瑪竇在一五八四年開始繪製的一系列世界地圖一樣，為了因應中國本位考量而移動本初子午線，將中國放在地圖中心偏左的位置。一六〇七年，王祈父子編輯《三才圖會》時對該摹本重加摹繪，收入地理類卷一的卷首²⁵。由於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全圖」原圖已佚，我們難以藉由比對原圖來確定地圖是否在流傳摹繪過程中經過什麼樣的變造。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幅摹本與利瑪竇於一五九五年在南昌所繪的「輿地山海全圖」以及一六〇二年在北京所繪的「坤輿萬國全圖」輪廓十分不同。與這前後兩幅利瑪竇的地圖比較，「山海輿地全圖」摹本不僅將經緯線拿掉了，而且這幅摹本還在地圖中央正北方出現了狗國。狗國即《山海經·海內北經》當中的犬封國。而在一五九五年與一六〇二年利瑪竇所繪的世界地圖當中，都找不到狗國的註記甚至是相對應的陸地輪廓。就常理來推斷，利瑪竇當不至於在一系列世界地圖當中，唯獨對於「山海輿地全圖」進行陸地輪廓的大幅度改造。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山海輿地全圖」中的狗國，是在地圖流傳過程中被加進去的。

在「山海輿地全圖」摹本當中，狗國不僅是在地圖正中、正北，而且依照比例看來幅員廣闊，幾乎與中國一般大。這實在是一個對利瑪竇世界地圖所做的極為有趣的變形。如果說利瑪竇是考量到了中國人的本位思維，因此移動本初子午線，讓「山海輿地全圖」當中的大明國盡量靠近地圖中央，那麼《月令廣義》當中這幅變造過後的利瑪竇世界地圖所傳達的訊息則很可能是：正因中國在世界地圖上稍微讓

²³ 關於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影響以及東西地圖文化交流的議題，最近的日、中文專著見海野一隆：《東西地圖文化交涉史研究》（大阪：清文堂，2003年），以及黃時鑿、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²⁴ 收入章潢(1527-1608)刊於1613年的《圖書編》當中的「四海華夷總圖」也包括《山海經》中的諸國，包括穿心國（應作穿胸國）、小人國、長臂國等。該圖右註有「此釋典所載四大海中南瞻部洲之圖姑存之以備考」等文字，說明此圖是基於佛教的世界觀所繪的地圖，而非受利瑪竇系世界地圖的影響。見章潢：《圖書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69冊），卷29，頁50a-51b。

²⁵ 關於利瑪竇世界地圖版本的考訂，見黃時鑿、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頁3-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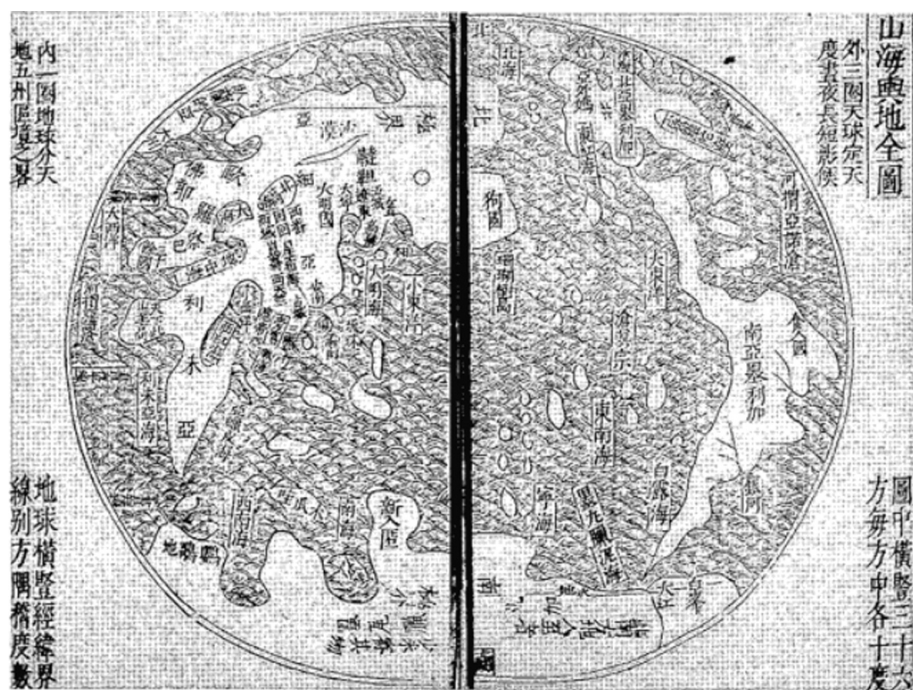


圖 6：《月令廣義》「山海輿地全圖」（1602 年刊本）

出了中央的位置，那麼在空出來的地圖中央該擺放什麼，反而變成了必須交涉的重點。「山海輿地全圖」的變造者將《山海經》中的犬封國填入了地圖中央的空間，說明了晚明人用以抵抗西方地理知識架構的思想資源是那些存在於古代文獻中的神怪傳說。這從明末清初反天主教的士人對於西方傳教士地理論述的反駁當中也約略可以窺見。與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1649) 同時的儒者許大受就曾經批評：「彼詭言有大西洋國，彼從彼來，涉九萬里而後達此。按漢張騫使西域，或傳窮河源，抵月宮，況是人間有不到者？《山海經》、《搜神記》、《咸賓錄》、《西域志》、《太平廣記》等書，何無一字之紀及彼國者？」²⁶ 從這一段文字裏，我們看到《山海經》與《搜神記》顯然被許大受作為批判西方傳教士世界地理知識時所援引的文獻資源。也正因為《山海經》與《搜神記》等文獻的記載在明末清初被士人視為據以衡量西方地理知識可否接受的標準，《四庫提要》在評論南懷仁

²⁶ 許大受：《聖朝佐辟》，收入徐昌治訂：《聖朝破邪集》（合肥：黃山書社，2005 年《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第 14 冊），卷 4，頁 3a。

(1623-1688) 的《坤輿圖說》時，才會認為南懷仁可以藉由依附其說於《神異經》等中國古代文獻中的地理記載來取信中國人²⁷。因此，「山海輿地全圖」摹本將狗國擺放在地圖中央，牽涉到的恐怕不只是西方世界地理知識與中國傳統華夷觀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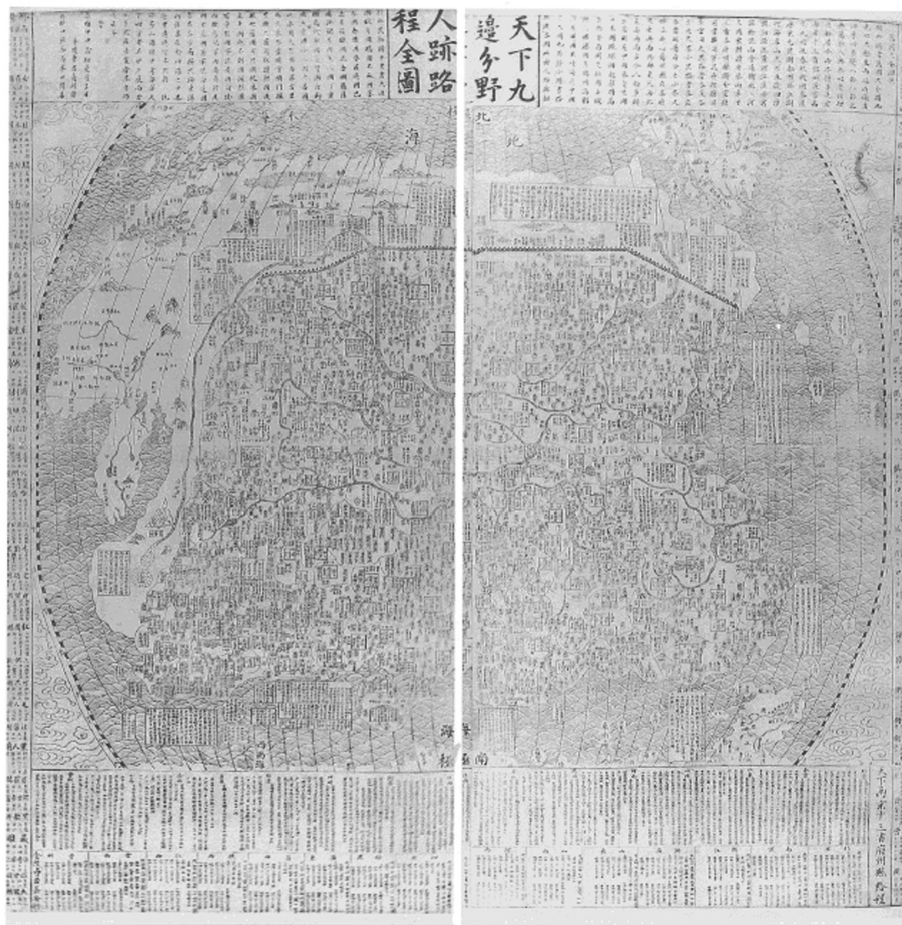


圖 7：「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1644 年刊本）

²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坤輿圖說》當中某些記述與《神異經》記載完全相合，因此「疑其東來以後，得見中國古書，因依仿而變幻其說，不必皆有實跡。然核以諸書所記，賈舶之所傳聞，亦有歷歷不誣者。蓋雖有所粉飾，而不盡虛構。存廣異聞，固亦無不可也」。見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71，頁 1921。這樣的說法並非毫無根據。利瑪竇在馮應京《月令廣義》刊行的同年秋天，於北京繪製著名的「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在此圖地中海的東北方與東南方分別註記上了《山海經》當中的一目國與女人國。這樣的做法，顯然是為了傳教所做的妥協。

的折衝問題，而同時還是諸夷如何取代中國，成為晚明世界地理論述話語的競爭場域的問題。

接下來，我將藉由分析晚明日用類書與世界地圖之間的互文性，說明晚明中國在面對西方地理知識傳入時，如何從日用類書當中汲取諸夷論述資源。除了「山海輿地全圖」以外，另一幅藉由西方世界地圖形式將《山海經》等古代關於異域的文獻中的國家表達出來的，是一六四四年由曹君義在南京刊刻的「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以下簡稱「天下九邊圖」）。「天下九邊圖」是由民間書坊刊刻，很能代表一般民眾對於西方世界地圖的接受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這幅標示出《山海經》當中四域怪物位置的圖，其實是結合了利瑪竇世界地圖形式以及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內容。這幅地圖當中有利瑪竇的世界地圖中所有的經緯線、大東洋、小東洋、北極海、南極海等等。但是，正如同海野一隆指出的，在巨大的中國周圍是分割、矮化了的西方系世界地圖的內容，而圖中經緯線僅是裝飾而已。海野一隆甚至因此在討論該圖時，特別註明「圖周圍的各類文字說明部分從略」²⁸。不過，我認為這幅地圖值得注意的正是位在邊緣的裝飾。我所謂的邊緣，不只是位於圖的邊緣位置的外國，同時還包括了地圖邊欄的文字說明。在地圖右下方靠近邊緣，由北到南依次有註記著女人國、毛人國、一目國、小人國等出自《山海經》當中的國家。這些國家同時也被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所蒐錄。地圖左邊邊欄的文字說明是諸外國，從上到下依次是日本國、琉球國、西番國、交趾國、占城國、爪哇國、三佛國、滿刺國、真臘國、勃泥國、火州國、哈密國、木蘭皮國、老撾國……紅夷國、二伏馱國、可只國、毛人國、注輦國、黑人國、藏國、巢魯果訛等等。這些國家不僅是出現在日用類書的「諸夷門」當中，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條目羅列的順序與一六一四年刊本《新刻搜羅五車合併萬寶全書》「諸夷門」條目順序幾乎是一致的。地圖下方邊欄的文字說明是晚明日用類書中必定會收錄的「天下兩京十三省府州縣路程」。當然，地圖上所列路程書固然不一定非出自日用類書所蒐錄不可，而也可能是來自未收入日用類書的單行本，但是，既然曹君義在製作地圖時已經確定採用了日用類書中的「諸夷門」部分，那麼我們可以合理推斷他實在無須捨棄手邊的日用類書不用而另循他本。也就是說，「天下九邊圖」的邊欄部分關於諸夷國以及路程書的文字，很可能全部是取自當時流行的日用類書內容。

²⁸ 海野一隆著，王妙發譯：《地圖的文化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頁75。

我認為，這些取自日用類書，並且被放在世界地圖邊緣的國家名稱以及天下路程書所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邊緣的點綴，不如說是提供了地圖閱讀者一個不論是實際圖式上的，或是抽象意義上的閱讀框架。在日用類書普及的晚明，人們絕不可能在觀看這幅與傳統華夷圖看似相差甚大的世界地圖時，而沒有意識到放置在邊緣的，他們所熟悉的日用類書中「諸夷門」與路程圖內容。在這種認知情境之下，一個非常可能的情况就是，「天下九邊圖」的閱讀者將這幅畫有經緯線的世界地圖視為日用類書「諸夷門」圖像化的結果。而路程圖也似乎提示著地圖閱讀者，這些《山海經》中的海外諸夷是可以藉由路程書的指引到達。這較之先前所談到的，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中強調諸夷來獻的朝貢想像有所不同。在利瑪竇系世界地圖的脈絡中，「天下九邊圖」將這些《山海經》中的海外諸夷描繪成可以透過路程指引到達，至少有著以下意義：藉由將「諸夷門」與路程書結合起來，《山海經》當中的非人類國家獲得與地圖中承襲自利瑪竇系地圖的西方國家有同樣知識上的權威性。這樣一來，我們就必須重新審視黃時鑿所提出的，包括曹君義的「天下九邊圖」在內的明清世界地圖，代表了牢固的傳統天下觀使利氏地圖熔入明清時代地圖的中華中心主義大統的看法²⁹。事實上，由以上對「天下九邊圖」的分析看來，這個用以安排、吸納西方地理知識的框架，並非只是一個抽象籠統的「中華中心主義大統」，同時還是來自晚明日用類書所特有的，對於天下州縣以及域外地理的論述架構。

然而，即使到了清末，世界地圖一直未能完全取代日用類書當中的「諸夷門」作為安置中國傳統異域知識的主要形式。這其實與中國傳統的異域知識表述方式密切相關。晚明日用類書中的古代異域地理知識，主要都是以敘事而非地圖的模式表達。在敘事當中，諸夷國之間並不存在著可以量化的方位、距離、國界與疆域的資訊。也就是說，在敘事式的地理知識當中，這些異國彼此之間都只是有著相互關係性，而沒有確定性。因此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存在著許多未知、灰色與可供無限延伸的空間。當晚明人被迫面對西方地理知識的衝擊，必須重新理解與定位古代地理知識時，這些由敘事特性所允許的灰色空間，提供了安置古代知識並且讓它可以與

²⁹ 黃時鑿：〈從地圖看歷史上中韓日「世界」觀念的差異——以朝鮮的天下圖和日本的南瞻洲圖為主〉，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59。

實證知識和平共存的絕佳處所。例如，一個神話中的國家可以被描述為距離應天府馬行三年的路程，而這永遠不會與任何其他地理描述有所矛盾與衝突。然而，這樣的空間是無法在將所有土地與海洋經由精確比例換算繪成的西方世界地圖上找到的。因為，當大地從邊際無限大、無限延續、無可到達的平面，變成了無論如何走最後都會回到原點的圓球時，那些古代山海異物存在的灰色空間也就無處存在了。當地從平的變成圓的時候，古代地理論述中的諸夷存在空間卻反而扁平化了。在這個意義上，十六世紀末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識傳入中國，帶來的與其說是中國對諸夷的認識，不如說是對諸夷存在空間的壓縮。而晚明日用類書則繼續以敘事與圖像的形式，將在無限大的空間與無限長的時間中的眾多諸夷國編織成一幅幅華麗繽紛的入京朝貢圖。

五、結 論

本文從比較日用類書的版本出發，主要討論了下列三個問題：（一）宋代官方類書所提供關於諸夷知識分類架構，是如何被明代的日用類書所吸收與改變？這樣的改變在晚明又有何社會、文化意義？（二）我們要從哪個角度來理解晚明日用類書中「諸夷門」的「日用性」？（三）晚明日用類書中的異域想像在當時中國對於西方地理知識的接受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藉由回答這三個問題，本文試圖說明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中的異域論述，如何能夠成為我們理解晚明人對於世界的想像方式的重要線索。

元刊日用類書的編輯者首先是以真實相對於傳說的二元性區分來組織異域知識；稍晚的版本則是透過層次的編排，將實證地理知識當作起點，依次往外推向《山海經》中的非人類國家，呈現出一種結合物類差異與文化階層思維的異域想像。這兩種編輯方式，某種程度上都是企圖透過編輯形式上的界線來創造異域論述中的秩序感。與元刊本日用類書比較起來，晚明日用類書當中的「諸夷門」看似最混雜、缺乏界線。但是，晚明日用類書其實卻是藉由一種強調可以透過交通工具將遙遠神祕不可知的異國與中國的關係具體化、經驗化的實用性概念，以細膩以及有創意的方式顛覆了過去日用類書中所顯現對異族進行掌握的思維。我認為，晚明日用類書編輯在類書不斷增補、改訂、重刊的過程中，結合了類書實用性論述與正史諸夷書寫的模式，打破過去日用類書當中堅持的文化／文本界線，重新組織包括

《山海經》在內的古代地理知識與元、明以後實證地理知識之間的關係，作為在朝貢體系崩潰的政治情境下，重新想像朝貢關係的嘗試。這樣一種存在於晚明日用類書中對朝貢體系的重新想像，或許可以被理解為對於晚明西方世界地理知識架構的另類反抗。而晚明人對於利瑪竇系統世界地圖的改動與挪用，一方面是關係到如何安置經由日用類書大量刊刻而被廣泛傳遞與接受的異域知識，另一方面則是在內容以及形式上再現了晚明日用類書中的異域想像。因此，對於西方地理知識的抵抗姿態，不僅存在於日用類書當中，同時也以帶著日用類書的某種物質性土腔的方式，滲入代表西方地理知識的世界地圖當中。透過這樣的分析，本文試圖跳脫過去學者在討論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時所設定的實證地理知識與想像虛構之間之二元對立框架，將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中的異域論述理解為日用類書對知識實用化的結果，以及在面對晚明朝貢體系崩潰以及西方地理知識的挑戰時，對於朝貢體系所作的重新想像之嘗試。

最後，當我們認識到，晚明日用類書在不斷增訂與改版的過程中，試圖重建與維持朝貢關係這樣一個事實的時候，我們無疑必須重新反省「日用類書」其「日用」一詞在理解晚明《萬寶全書》系列類書時的有效度。酒井忠夫所謂的「日用」指的是「作為日常生活實用指南」的概念，這樣的概念當然無法用來理解至少是「諸夷門」這樣的類門。而即便我們重新定義「日用性」，將它視為一種關於日常實用的論述，從我們上述的討論來看，它顯然不是一個可以完全概括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文化意義的統攝性概念。從《事林廣記》到《萬寶全書》系列，「諸夷門」的形塑歷史其實代表了類書編輯者透過重新定義已有的知識範疇，對現實政治與知識體系危機做出反應的過程。在這層意義上，類書「諸夷門」編輯所展現出來的，其實不只是一種關於日常實用的論述，同時也是一種對於重新理解變動世界需要的敏感性，以及透過調整既有知識架構來滿足此一需要的即時性。